

导论

单元庄

一位哲人说过：

“理解一个时代的人们怎样思想，要比理解一个时代的人们如何行动更为重要。”

思想，永远是人类行为、制度与文化文明的先导。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一切历史是思想史。

一、问道

遥望 2000 年前那个被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称之为“左右着人类的整体精神历程”和“超越时空领衔人类思想”的“轴心时代”，仰望人类思想星空中依旧巍立的思想巨擘们——文明古国里的苏格拉底、释迦摩尼、孔子、老子、庄子、孟子、亚里斯多德，是他们，在那人类精神与物质世界伟大转型跨越的时代，缔造了关于人与人（古中国）、人与自然（古希腊）、人与超验世界（古印度）关系的终极“圣思”。为此，穿越时空，古往今来的人类对他们始终由衷地满怀敬意。问题是，今天，无论是西方世界还是东方古国，不断重温嚼索他们的思想精粹的人们开始惊讶地发现，当今时代的“转型跨越”之剧烈与所面临的困惑，不亚于当年——

当堪称“近代人类文明先驱”的西方相继走出黑暗的中世纪，历经王权取代神权，又以人权取代王权，人类文明步入“人本主义大时代”，在这一过程中，对生存物

质需求优先满足的欲望,使人类走向了“物欲主义”和傲慢的“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不再怀着敬畏之心承认自身不过是浩瀚宇宙的一粒微尘,不再尊奉自身生命与宇宙万物享有同等尊严的理念;与此同时,东西方近现代哲学不再对“天人观”、宇宙本体论、世界观寄予高度关注与追询,而转向实用功利主义的价值论、技术论、工具论和方法论,由重农、重商主义走向了权利崇拜、货币崇拜、金融崇拜……

——于是,作为先导的“思想”必须回答:失去了“天人”本体宇宙观和世界
观的人本主义和价值论,将把人类精神世界进而物质行为世界引向何方?

当人类还在自己的幼年时代,而现代智能技术、网络系统科学与当代医学已培育出具有 100% 人类基因的大脑,3D 打印则能够再造人类的肢体乃至器官,智慧机器人已能够集中群体乃至人类智慧,从而开始在局部领域超越人类,等等。人类,实际已进入“再造第二人类世界”;与此相同步,人类也将自身之“私欲”、“恶欲”移植入机器人人类。美国电影《机器战警》、《超能查派》、《机器人战争》虽是影视中的未来世界,却符合人类科技发展的逻辑,预示了发展的趋势……

——于是,作为先导的“思想”必须回答:人类是否要再造一个“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的“人—机世界”,使社会陷入“善”与“恶”更高次方的争衅中?

当网络智能技术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改造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冲击着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科技、工程等等人类存在的根基,加速着“世界经济一体化”、“世界文明一体化”,同时,又促使人类思维碎片化,走向个体自闭、以邻为壑的“个人中心主义”与“共情危机”;在加速物质技术世界进步的同时,使人类相互防范、威慑、仇杀、征服的技术空前提升——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冲突”与“9·11”拉开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愈演愈烈,人们必须承认,愈是现代的战争,其规模、凶残与阴毒愈超越以往和远古;更令人倍感沉重的是,在全球现代化论者和科技预言家笔下的,是两极分化加剧的阴冷的“未来世界”……

——于是，作为先导的“思想”必须回答：今天的人类文明是否进入了新一轮冲突与火拼的恶性高峰期，人类社会是否真的无进步可言？

1992年，美国政治学家弗·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将西方民主化视为人类社会演进的终点，“小政府大社会”似乎成为现代化的基本格律与世界共识。然而，曾几何时，一方面，一系列后现代化国家“颜色革命”的失败、世界金融危机与各种各类“文明”危机愈演愈烈；一方面，挪威、德国、丹麦、南韩、新加坡诸国“强势政党政府+法制+民主+市场”的成功范式表明，世界现代化已进入“多元化”的重大转型期。2014年在新版的《政治的秩序和政治的衰落》一书中，福山开始将强势政府、强力法律和民主并列为民族国家现代化的三大支柱与保障……

——于是，先导性的“思想”必须回答：这一现代化战略转型终将走向何方？备受争议的权威主义“中国模式”能否走出可供示范的现代化之路？

当中国史学与思想界新的研究成果渐次澄析揭示出涵盖了古代“天人宇宙观”、东方大国礼乐法度体系设计与“民本”民生治理实践，亦为古典儒学奠基的“周公型模”^①对中华文化文明的源头性影响；展示出中华政体文明历经周公制礼作乐、春秋百家争鸣、汉初盐铁建制奠定“古代中国模式”的政治、思想、经济三大根基，于盛唐，创建具有“集权、法治、精英治国”为特质的“王一士二元开明政体”，达至世界古代政治文明史的辉煌顶峰，而非“黑暗独裁专制”的史实；揭示出元明清实施专制独裁以及草原奴主制度，致使中华文明转向衰颓朽败的历史大转折，等等……

——于是，先导性“思想”必须回答：中华传统文化文明史是否需要一次新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

自《易》《书》奠基，由庄子“内圣外王”统御，作为中华文化文明主流的儒家思想体系在漫长演绎中一波九折——首以疏离中华帝国初建时期大政治家周公的大国

^① 见本文集胡义成的文章《“周公型模”及其现代价值》。

治理思想、礼乐法规与政治哲学体系，“去周尊孔”；遂有将为王之道变为“先王而圣”，令古典原旨儒家思想渐次演变为训导儒士举谏辅佐之思想规范；于盛唐和宋，行“民本”民生治理、科举取士、精英治国，将古典儒学价值观与政治哲学升华演绎至峰巅；至元，拒斥汉文化，而至明，明太祖始行独裁专制，于清，满蒙贵族推行草原奴主制度，儒学已演变“专制统御”工具和文化人内省自保之哲学，继而蜕变为“犬儒之学”；最终至清末，竟被知识分子视之为“奴学”，奋起打倒，等等——于此几经充盈衰变，儒已非祖儒，孔亦非原孔；特别是面对缺乏周公治理大国之大气度大思维的制度设计实践历练，多具纤弱文人理念色彩的“晚近儒学”，人们不能不深陷迷惘……

——于是，“思想”必须回答：今天，传承中华文化文明优秀传统是否先要有一次“儒学革命”，并对被称为儒家主流的“民本”思想何以未能防止帝王专制，再做检讨？

认真思考西方大工业时代的资本发展史，梳理由市场交易的一般等价物走向“资本经济”、“资本政治”、“资本文化”乃至“资本社会”过程中，“资本”所具有的原旨性“本质”——“自由竞争、平等民主、破坏性创新”之“善”，与附丽于人本主义大时代初级阶段的“极端物欲主义”之“恶”，反躬“金钱崇拜”对中国现代化崛起的灾难性破坏、国企改革与民间资本的几起几落、现实中国的畸形“资本—财富观”……

——“思想”应该回答：在中国，什么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弘扬的“资本—财富观”？

当人们面对现实中国的群体性民族性的价值迷惘、信仰缺失、伦理丧失，不知是否还能够想起九十多多年前，孙中山先生领导中国走向民主共和过程中设计的“军政—训政—宪政”^②路线图。近半个世纪世界民主化进程表明，没有一个既对政府

^② 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先生在《中国革命史》一文称：“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转录自2009年04月11日22：51凤凰网历史综合栏目。

及成员进行公共权力意识角色素质培育和对国民的现代公民意识角色素质培育的“训政过程”，是不可能真正建立现代法治社会、宪政民主政体和实现国家的现代治理的。

——于是，“思想”必须回答：中国能够绕开这一“训政”阶段吗？

回首百多年来跌宕起伏的现代国家治理史，总结 1949 年以来曲折跌宕的“试错型”国家治理理念与实践，以及权威主义“中国模式”的教训经验，特别是展望未来，面对当今“知青存在主义”国家治理模式有否为 80、90 后的网络“地平”思维、“网络自我中心主义”及“自由享乐主义”价值观与体制取向取代的现实发问……

——于是，走向未来的“思想”必须回答：二三十年后，新的“主义”将引领中国走向何方？

当经历了元明以降的社会文明衰退，又承蒙百年激进反传统的唯理主义、民粹主义、极端物欲主义和目的正确可不择手段的积极自由主义思潮的“照拂”，中国正面临能否走出衰颓之谷，实现再度崛起的重大抉择；与此同时，东方古国正在呼唤思想主义层出百家争鸣齐放的新格局，呼唤复归鼎盛必需的新思想、新思维和新的“轴心时代”……

——于是，“思想”应告诉我们：东方古国逆转乾坤的转折点在何处？打开新“轴心时代”殿堂的钥匙在哪里？

从“宇宙本体论”到“人本主义物欲时代”；从资本原旨之“善”、“恶”到“未来人—机世界”；从当今世界的文明冲突、现代化转型到权威主义“中国模式”；从“周公型模”、“古今儒学辨”到未来国家的“治理主义”；从寻找精神家园、“现代训政”直至呼唤“新轴心时代”等等，在林林总总的现象精神大世界，这十大问题只能是人类思考的九牛一毛，但在“走向未来的世界和中国”这一宏大论域，却为“纲”为“领”。毋庸讳言，仅就这几个纲领问题，足以耗尽数代思想家的无尽才华，更遑论我辈。不过，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而在于它们共同指向了同一个“目标问题”：未来！

也就是说，对我们这一代学人而言，更为现实的问题是——何为未来之“道”？

二、论道

在本文集《序言》中，成中英先生说：

“为观念创新倾力，为体制创新建言，为持续改革谏策，则不能不成为当今学界及有识之士之共责焉。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即当今我辈学人，若不能“闲邪存其诚”，“修辞立其诚”，正心以立本，去私以举德，断浮夸哗众之风，绝犬儒奉阿之性，又焉能顺时代之潮流，应国族之需求，衔天下民众之所望哉？”

亦如法国巴黎公社失败后一位先哲所说：

回到书房去，为未来锻造新的理论利剑。

正是持此使命自觉，我们这一群经历了文革风暴与改革搏练的思想者，又一次从各自的专业领域走向这一组“问道”论题，开始我们新的耕耘，新的思考。

人类思想之“利器”总若暗夜长空之霹雳，能够在瞬间将宇宙万物照得通体明澈。

这里，奉献给读者的是我们再次组合后的第一批成果，其“根”深植于数千年人类行为实践与创造垦殖的广袤疆土，“源”于那浩瀚的人类思想精神的云垒苍穹，“流”则融汇于人类生息进化繁衍破坏与创造的时空长河之中。

本文集收入的12篇文稿从不同角度涉足上述时代大问题，于“问道”的问题下，又在中西哲学、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教育诸领域作专题弈论；每篇前有作者对文章的“提要”。依据文论主题与属性，文集分为“史论”、“文化”、“经世”三部分。

(一) 史论

作为“史论”部分的首篇,国际著名学者成中英先生在《〈尚书〉中的政治哲学:德化论》^③开首就明确指出:“我的论文主旨在揭橥与论述‘德化’为政道的起点与理想,治道为达致政道理想与目的的方法与过程”;“以此为基础,形成‘德、政、治、法’合一的政治哲学理论。”成先生以宏阔深邃的哲学史视野,从中国政治哲学的根源、重心、儒家“天人宇宙创化论”及其三阶段(即易学宇宙论,天命—德化论,孔子后的仁义论)入手,论证了周易哲学与尚书哲学、“天命观”与“德化论”的关系,分析了东西方政治哲学“天人一元论”和“天人二分论”进而“德化论”与“契约论”的区别及其深远影响。针对牟宗三先生所谓中国有“治道”无“政道”的观点,文章指出:“在禅让制下,政治领袖能选贤继之,从而实现以民为本、顺乎天心民心的政治,这就是中国的‘政道’之传统”;“这种政治,要求以民为贵、以民为主,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民主’政治。”这一论断直击对古代中国政体与政治哲学的种种误论,意义不言而喻。值得重视的是,文章提出,“儒家思想‘以民为本’,自汉以来,在中国成为主流思想,但却未因此防止帝王之专制”,这一发问,振聋发聩,直击中国政治思想史中长期激辩且在政治制度实践未能解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在文章最后,成先生特别指出:“今天中国走向国家富强的道路之际,应当了解德化论‘政道’的重要性,也应明白中国固有‘政道’之传统,不须待西方之‘政道’以为唯一楷模,而自有宝贵的政治典范传统。”

成中英先生的“德化塑治论”体系,不仅对我们今天重新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质及演绎主脉络,尤其是对中华文化文明核心的政治文明及为其魂魄的政治哲学,有了更加清晰深刻的认识与把握;对于今天,为实现“中国梦”所进行的有别于西方的现代化国家治理模式的改革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就本文集所涉诸论题而言,成先生之论与后续胡义成的“周公型模”新论、尤西林的公私德理论、赵永泰的“三个中国”论、王随学的百年思想文化史论等相协提,亦与张西平任大援的

^③ 基于人类社会是一个“塑造”与“治理”的动态过程,笔者将成先生的“德化论”称之为与西方“契约论”相迥异的“德化塑治论”。

“西学汉籍”评介、刘明沐的“中国文化建构路径”设计、古旭奇论“道德危机与传统文化价值观”、苏忠单元庄赵永泰关于“中小微企业的时代价值”三人谈以及单元庄对千年科举与百年高等教育之检讨等专论题相呼应，实有贯领主旋格律统协交响乐章之妙窍。

同样跨越数千年在历史的今天，追索中国古代治国方略形成发展的源流脉络，探究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哲学基础，研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明中“天人宇宙观”与“民本”核心价值的现当代意义，原陕西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胡义成研究员《“周公型模”及其现代价值》一文对“周公型模”的系统归纳阐释，与成中英先生的“德化论”相契相彰，珠联璧合，展示了中华民族国家初创组建过程中的恢弘场景、“天人”宇宙观及其立足于“民本民生”的深邃博大的哲学体系；揭示出伟大政治家周公姬旦以中华辽阔疆域为背景，奠基构建的适于古代“大体量”疆域的“全球最先进的国家治理方式”和中华“仁道”政治模式。“周公型模”崭展新容，横亘历史，穿越时空的时代价值，不仅在于它筑基于东方文明古国，醍醐于近代西洋，凌越于“丛林法则”，“是人类和中国价值观的最佳选项，是中国人真正的精神家园”；在于它呼唤思想学术界对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明“主旋律”与发展脉络作新的梳理、辨析与认知，特别是对主流思想体系的“古典儒学”、“秦汉儒学”、“唐宋儒学”、“明清儒学”和“百年儒学”作重新解读与阐释；而且在于它给予今日中国进行国家治理的哲学基础重构、模式创新、体制再造以深刻的启示。由此，自然赋予了胡文及“周公型模”以基理厚重影响深远的能动意义。

当年出席“莫干山会议”并荣获1985年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讨论会优秀论文奖的经济学教授赵永泰的《中国之船》，循梁启超“三个中国”之划分，以同样大气度、大格局、大时空视野，对五千年中国史、近300年世界史和当代中国剧变及其未来进行了重新梳理，以其博学和敏锐哲思，勾勒出新的脉络体系，提出了诸多发人深省的理念。如对于人类长期衍存的方式，文章指出，“中国从秦朝以来所形成的这种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天人合一的农耕社会或许是最有益的，它能使宇宙在其演变过程中形成的地球上的资源得到细水长流式的利用，而不像当今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快速掠夺式的掘取地球有限的资源。”这一公允平实之论，却有警世发聩之效。对于近代中国落后之因，文章指出，制度是文化的产物，文化的核心是哲学，今天，我们的哲学落后了，制度与文化落后了；近现代科学由“思想实验”推进和检验，当

西方学者越来越多地采用“互补”理论和方法去看待世界和研究问题时,中国知识界犹抱传统“体用”思维与定势而难以真正与时俱进;对于网络一代和中国的未来,文章清醒地指出,不是执政的领导集团要把他们带向哪里,是他们的迅速崛起,主导中国前行的方向!此等发微徵质之论不仅赋予“史观”以新的视角,将读者的思维视野提升至新的高度,而且指出了未来研究与预测所应遵循的重要轨迹。

作为启初中学时代的“老媒体人”,王随学以《中国不必再“拐弯抹角”》的坦直,由“一部中华文化史就是儒学史”开篇,论及社会链条和儒家文化屡屡断裂之“主因”,呼应了成中英“民本”儒学未能防止帝王专制的时代问题;遂而回转笔锋,于察微知著,厚积薄发中,对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革命文化”、“破私立公”时代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改革文化”,做了系统盘点。文章指出,改革开放作为“超前”政经结构退一步进两步的理性回归,此时期以讴歌改革为主调,以致富为亮点,伴随市场机制“接轨”西方文化,一任物欲主义“雾霾”迷障等等的“改革文化”,其主流尚处于飘摆、苍白与缺失的状态。文章精到地指出,近现代“中国文化的最大特点是以简捷凝练形式倡导的‘政治文化’为统率”——这一东方大国的文化治理范式 and “社会动员”模式,显然既超离政治,亦跨越了国界,具有更深广的“自然选择”意义;通过总结资本主义曲折发展与当代中国的迅猛崛起,文章十分经典地提出,今日世界较量之关键,是体制模式的“弹性”与“张力”,中国在总结两种社会形态消长和所谓的“大溃败”中,选择了一条复合型的“二元之路”;王公断言,历史将证明,这一“中国模式”作为人类社会多元自我选择和现代化的分枝,将更具“弹性张力”而成为现代化新的“主流形态”,等等。令人于拍案之余方悟其坐拥数千万网媒“粉丝”的厚重底蕴。

(二) 文化

与前篇相承续,体现着“文革一知青”一代思考者于国家民族依旧的忧患情怀,在《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公德与私德问题》中,中华美学学科带头人尤西林,论析了中国现代化最重要的“公德建设”问题。文章首先阐明,晚清思想界提出的公私德问题,是中国现代化的共生内涵问题,而中西文化比较是衍生参照问题。因此,不能将其“形而上学化为中西文化优劣争论问题”,“以‘中—西’遮蔽‘古—今’”。文章

指出：“公德的本意，实际上是一种公共关怀，是一种公共精神”，其“意义集中的体现是政治”；“在传统革命伦理继古代伦理后衰落的当代中国，私人伦理借助江湖伦理延伸自己的普遍性”，“支撑了痞子文化的抬头。”遂而，文章将论域提升至历史高度，尖锐地指出，作为中国伦理首要危机的公共伦理缺失，导致“国家（权力）部门家族血亲化”，而“血亲政治”，“是古今中外‘特殊利益集团’（包括权贵资本集团）形成的伦理基础，是对现代公共社会政治的反动。”文章强调，现代公私德分化、个体人格的公德承担、公共关怀精神，是公德建设的三个方面；公德建设不仅是伦理信仰与行为的教化，同时是“公民”权利的实现。但凡读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读者应对该书的“附注”有深刻的印象，在这一点上，尤文与之有相似之处——在前文论证“血亲政治”严重危害的基础上，通过《附论》论析了“超血亲伦理”的深远意义；而“附注”中的一系列典型案例则令人回味无穷。

当读者或已习惯领略较为深沉严谨的推理与思考时，文如其人的“游僧教授”吕晓宁，把我们带进了一个令人眼花缭乱，充满了清新气息清新思维清新理念清新问题的世界。《网络一代和他们的未来》如加一个副标题：“网络一代主政下的新的世界与中国”，会更加引人入胜。文章开篇在嘲讽了曾被老一辈百端疑虑的“新生代”成为时代“主宰”，终而伴随年轮也变为“九斤老太”的人类轮回闹剧之后，揭示了人类演进史上的一个永恒命题和规律：人类“新生代”总是凭据其赖以成长并走向时代主体的“代际文化基因”塑造新世界！由此引出一组时代大问题：现代网络文化塑造的“网络一代”如何凭据属于他们的“代际文化基因”去主宰、塑造未来世界？他们的“代际文化基因”是怎样的？他们凭据“代际文化基因”将塑造一个怎样的未来世界？文章告知读者，这种“代际基因”源于以时尚娱乐消费为引导，以网络青年为主体，蕴含了新时代的思想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大众“网络文化”；这种基因文化以其无所不至的互联、去中心与层级及对传统时空理性的解构重构、自我自主自由意志、感性化世界观与生活、独自的语言和网络社区世界、“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体”等特质，“将世界放在你的手中”，给人类一次带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结构价值与发展模式的重构，一场关乎历史进程的革命。这就是网络一代的“代际文化基因”和“革命的原动力”，这就是网络一代带给世界的尚待展开的未来！

大音希声。自古至今，总有一批人类历史足迹记录者、采掘者、复制者，以默默的辛劳，采撷文献瑰宝之灵光，普照东方与西方、物质与精神生活，再现、改写、重塑

着人类的昨天今天与明天！张西平、任大援的《论明清之际“西学汉籍”的文化意义》，述评了承续前人，以七年心血将 1300 多种“西学汉籍”梳理东归的过程与价值，向世人展示了世界文化文明史上一个重要时段——东方明清鼎革与西方文化全球扩张时代，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融合交流的更为绚丽的画卷。以新的史料更清晰地展现出由“西学东渐”所激扬喷涌出的新词汇、新概念，如何构造出东方新的认知体系，直接影响人们对世界和时代的理解，成为华夏民族新思想新文化乃至新制度酝酿产生的基础；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由此“灵光”照拂，不仅中国近代史、思想史、政治史、文化史、宗教史、科技史，以及世界近代史乃至“资本文化史”，将被重新认识甚至改写；新文献以“西学东渐”更早时期大量东方文化渗入影响欧洲文明的史料，揭示了东西方文明由内生性蒙启到外溢性交流，协力拉开世界近代史帷幕的史实，证明了：东西文化存在着共同的 DNA！对于破除世界近代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提供了新的证据。拨开历史当年的血火硝烟与恩怨，在先祖异曲同工的“破坏性创造”中领悟“殊途同归”的历史逻辑意义——是人类不断认识自己走向成熟的永恒前提。后晚们永远敬重“太史公”们的因由，亦在于此。

目下，能够在衣食逼仄居乏定所之中甘坐“冷板凳”，追寻民族文化根脉，思考国家未来的年轻人确不多见。工学出身，在中国科技大学相继获得管理学硕士与哲学博士学位的刘明沭，于艰难地“自主创业”的同时，专注研习与弘扬中华文化，《面向未来的中国文化建构路径》是其多年“修炼”的成果。文章以清晰明快亦较为厚重的笔触，对中国文化做颇有见地的论析，将“文化”定义为基因型和基因表现型的综合体，以此诠释中国文化“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自强、以和为贵”的基本精神及其以“仁”、“和”、“生”为主要特征的演绎形态，进而提出未来建设中国新文化必须完成“从精英文化到大众文化”和“从传道授业到转识成智”两大根本转化。在中华文化研究领域，古近姑且不论，仅就大家林立，新说辈出，专论不胜枚举之今天，于其文之评价，自然会是见仁见智，但于“文化基因”、“三大形态”、“两类转变”中透见其底蕴学养、责任情怀与独辟蹊径之精神，实为难能可贵；尤其是阐释词源佛学的“转识成智”“是一个在实践过程中超越已有技艺知识且赋新升华直至‘物我合一’、‘古新相融’、‘道我一体’境界”之识见，令人肃然。

日本欲通过全盘西化成为西方世界东方代表的百年修炼终未成正果，这一史实告诫世人：一个具有悠远厚重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国家，不能抛弃自我民族传统

魂魄,凭空嫁接异邦文化与文明,更不能奉其为主臬。殷此史鉴,古旭奇的《道德危机与中华传统价值观的重塑》以“一个以自己民族文化的圣人为耻的民族是永远趴下的民族,是永远在精神上站不起来的民族”为基理,从分析当前道德危机缘由入手,对中华传统价值观的源头、内涵与核心理念及传承重塑路径做了系统论析。作为当今重大热议题,作者论见可圈可点,特别是作为一位由高级讲师转为企业管理人员,如今创业为物联网企业董事长的“业余研究者”,能有此学养学识,本属不易;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文章对以《周易》开山,唐宋达至鼎盛,明清急转颓唐,辛亥百年陷入间歇迷惘的儒学与中华价值观作了扼要梳理后明确提出,探索创建新时代价值体系,“不能简单将明清以降专制高压下‘犬儒化’的儒学,视为中华文化文明的优秀传统及其原质性的核心价值体系。换言之,对于儒学思想与价值体系,对于中华传统文化文明和价值观,迫切需要一场新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需要一次重新回归、重新解读、厘断甄别、系统梳理;需要一次在全面、公正、客观基础上的传承、弘扬与创新!”此语当属振聋发聩!

(三) 经世

经历逾十年的“国进民退”,国企改革步入新阶段,“中小微”民营经济生存发展合理性与制度环境问题重新成为热点话题。在《中小微企业的时代价值》(三人谈)中,部队记者出身的北京大业传媒集团董事长苏忠,立足于中国社会结构战略转型,深刻指出,中小微“是中国中产社会的最重要的源泉”,而新型中产“与19世纪的欧洲资本家有天壤之别,因他们从既定政治体系中崛起,并始终与之关系密切”;同时,针对部分学者不接地气,逢迎附阿,崇尚空谈,误导现实的劣习,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单元庄曾任《福布斯》中国民企排榜位居榜首首位企业的总裁,依据对民营经济的深度考察强调,从理性高度全面科学地认识如下三大因素:1. 近300年人类社会“物欲主义大时代”的主体特征,2. 资本“自由、竞争、平等、民主、破坏性创新”之“善”与短视“物欲主义”之“恶”二元属性,3. 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双重影响,是创建新时代主题价值,构建能够充分彰显资本本质之“善”的制度环境与“资本人格”的现实基础。早年在莫干山纵论国是长于经济哲学和大历史视野思考的赵永泰指出,建立稳定的中产契约社会和新型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作为人类文明基本重大标

志的“产权分立”；“产权分立”本质体现的是以“人”为圭臬的时代价值与需求，而“中小微”正是这一时代价值与需求的产物，因此，必须站在这一高度认识“中小微”存在的价值，才可能避免步入实用主义机会主义歧途。三位论者从现实中国、经济史、史哲学视角对“中小微”进行的多角度系统论析，极富历史感、启示性和预见性。

二十多年前就高擎“公平与效率”论帜以警示业界学界政界的陕西省改革发展研究会会长，工业经济领域资深学者曾昭宁教授，与其《丝路战略中中国老工业基地与中亚国家的工业互补论析》课题研究团队，详实论析了“一路一带战略”背景下的“国际产业互补模式”，提炼出“三外一链一市场”——通过实施“‘以装备换资源’为先导的外贸战略、‘以资金换资源’为重点的外资战略和‘以技术、劳务换资源’为主的外经战略，建立西安—中亚国际化产业链和国际市场体系”的发展思路。此中“互补”二字之深义，自然不仅仅是对中国老工业基地城市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国际化、现代化提供诸多启示与决策基础，更重要的是，作为现代化核心与基础的工业化及其战略路径调整，是现代国家经济文化政治结构与体制转型发展的前提与保证，是现当代国际关系由以“森林法则”和强权政治为特征的“霍布斯主义”和以全球市场、国际法、国联(联合国)为基础，以“国际主义”为特征的“洛克主义”，逐步走向强调道德标准和理性原则，主张通过国际规范和超国家国际组织以稳定国际秩序的“政治理想主义”亦即“康德主义”，并在实践上推动全球治理由“一超多强”转向“二超多强”的全新基础。换言之，“互补论”之意义不仅限于“一路一带”和经济领域，同时兼具影响全球治理的今天与未来之价值。

阅历千年的中国高等教育一度摒弃了开明进步的唐宋科举，走向明清专制奴主制度下的犬儒主义，又在蔡元培崇奉的洪堡“寂寞和自由”模式、摒弃高等教育“上层再生产”质性的“商业产业化”模式间徘徊了百余年。今天，在大时代物欲主义^④、近现代大工业的批量化需求压力下，肢解背离了以“信仰、创造、育人、独立、批判、服务”为特质的现代大学精神，服膺于实用主义、拜金主义与科技工具主义，陷入了“信仰价值迷惘”、“体制行政化”、“基础素质低下”三重危机。在《千年科举/百年西化与高等教育》一文中，单元庄强调：有别于近代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立基

^④ 见前文对《中小微企业的时代价值》的评价。

东方传统国家主义^⑤的“先天下”价值观，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优秀传统和首要特质；其于盛唐，衍生出培养具有“天下情怀”治国精英的目标价值，学者治学、思想独立的科举教育体制，塑造出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成为西方文官制度源头的“考官制度”，成就了人类政治文明史中辉煌的“王-士二元政体”和世界文明帝国，并在抗日战争 70 万大学师生跋涉 10 余万公里保存中华文化根魂的“文长征”中得以弘扬。文章指出：当今世界，大学共同面临因臣服现代科技、市场利益而丧失大学本义，失却信仰秉持与独立批判精神的异化危机，因此，克服“异化”、“臣服”，重塑“现代大学精神”——将是新一轮中国与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主题！

当网络智能技术作为现代化转型时代的强悍动力，世界不同种族、地域、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与文明日益深度地链接组合为一体，人类思维也愈益由类似 18 世纪自然科学的“分析时代”走向交叉互渗协同的“网络综合时代”。人们面对的现实愈益纷呈繁复，扑面而来的信息如云如海，未解无解难解的问题及其隐藏在背后的成因，往往如同“蝴蝶效应”里德克萨斯州的龙卷风和亚马逊雨林中偶尔振动翅膀的那只蝴蝶，仅从单一方向去调整思维已远远不能从容应对。网络化智能化逼迫人类思维摆脱经验巢臼与形上传统的困扼，会凌绝顶，从多领域、多层面、多维度去把握多种因素所形成的“合力”及其结果——这，也正是本文集的方法论基础。

如果说 2000 年前“中轴时代”的伟大思想家解析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超验世界的关系，那么今天，由此三大关系衍伸出的是“人与人塑世界（自然、社会、新人类）”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又是一个“人与未来”的关系。

汇总回瞰各位学者的精思萃理，从成先生之“德化塑治论”肇始，继而“周公型模”新论、公私德辨析、“三个中国”论直至丝路中的“互补论”与百年高等教育检讨，从东方到西方，从古代走向未来，由形而上的哲学圣殿，走向凡俗物化的人间诸业，此番思理所揭桢抻开的是时空长堤中一注古往今来充溢奔涌交织着无穷躁动迷乱升华倒退血与火情爱与仇杀的神思物理灏远博大的多维物象洪流。依成中英先生的“德化塑治”维度与视角遥遥望去，于莽莽苍苍而又律动迷幻中析理出的是：相对于数十亿龄的地球、千百亿年的星云，作为宇宙微粒的幼稚的地球人社会还在蹒跚学步，并将在文化文明的交织融汇创造冲突仇衅与破坏中行进数千数万乃至数亿

^⑤ 国家主义 (Statism/Nationalism) 是以国家利益为神圣本位的政治学说。

年。方才离开襁褓的人类需要的不仅是物质滋养,更需要精神的导航,需要去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认识未来。其中,最为紧迫的需要是对人与外部(自然、超验与人造)世界的认知,是要明了:人类世界最原始最基本的生命神秘源数是人自身,是“人”内心世界的“善”与“恶”——诚如雨果所说,比深湛的大海更加浩瀚的是蔚蓝色的天空,比蔚蓝色的天空更加深奥莫测的是人的内心世界(大意)——人的外部世界,亦即上述多维交织的物象洪流,不过是内心世界的“外在表现”和塑造物。——由此内心襟怀的“德性”两极发轫,人类世界便不幸永恒游走于善与恶两极间的无穷谱系之中而永无争斗冲突的平息。

面对这“二元德性世界”,人类,也许只有两种选择,其一,在相互理解依存包容中塑造一种人类共同崇奉的信仰,并运用现代科技将人类 DNA 加以改造,最终创造出更文明更善良直至“无恶心”的人类和一元德性世界。否则,再多的伟人、再多的轴心时代、再多的不朽思辨、再多的制度创新、再多的破坏性创造、再多的文化文明遗产、再多的理想与可歌可泣的伟绩……必然永恒伴之以更多的枭雄、更多的危机时代、更多的邪说、更多的邪恶组织与制度、更多的倒退性破坏、更多的历史忏悔与耻辱,人类永远是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中蛇行;区别仅在于“道”与“魔”相应呈现多样色彩,由此人类继续编导着形形色色光怪陆离五色杂陈的喜悲剧,而永无脱离善恶争衅的苦海。

要么,承认现实,在永恒的争衅训诫中持续增饰着从信仰信念制度文化习俗宗教科技艺术乃至军事的扬善抑恶的制控制导体系,并运用科技的力量纤细点滴地重塑着“善”不断超凌于“恶”的人类、“人—机人类”、“地球—外星人类”以及由人类之“善”主导的未来世界。

也许,今天呈献在读者面前的,就是这后一选择的努力。

三、结语

当代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有句名言:“我在哪里,哪里便是中国。”由此,除了透见先生于中华文化文明无限厚重之情感与自持自信外,也许还可解读为,“我在哪里,就会将中国之魂魄带到哪里”,抑或“就会在哪里塑造出一个不朽而伟大的精神

中国”。凡此种种，也许是我等后晚之辈的妄度，但于我们这些成长于中华文化文明发祥之地，执蜚沐浴张载“四为”之光的“老五届”大学生与老三届“知青”，引鉴名言意在表明：在时下利欲横流功利甚嚣尘上的价值雾霾时节，总还有那么一批“愚顽”，秉持“天下情怀”，在各自专业学科的冷板凳上续写着自己人生的一种价值追求、一种信念、一种信仰；同时，也借此名言，寄托一种期望：这一用我们的心血、思想、信念构筑的未来世界与中国，能够与我们的生命与精神所至同在！

起笔于 2015 年 9 月

定稿于 2016 年 2 月除夕之夜

论道之一：史论